

沈德潛的詩學歷程及其相關研究評估

Shen Deqian's Studies in Poetry and an Assessment of His Related Research

陳岸峰 (Chen Ngongfung) *

一、前言

有關復古詩派¹的論爭，從明中葉至清初，眾說紛紜，向無定論，及至沈德潛（確士，1673-1769）在詩壇的崛起，其對復古詩派的批判性傳承及其所建構的具有創造性與突破性詩學體系，方才解決了長久以來的詩學論爭，復將格調派的詩學推向新的高峰。沈氏既有深入探討詩學理論的《說詩碎語》，又編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宋金三家詩選》、《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以及《杜詩偶評》等六種選本。這六種選本，既是其詩學理念的具體體現，亦是針對自明中葉以降各種不同選本的缺失而作的彌補。由此可見，其詩學體系之精密與深邃。除了理論層面與實際批評兼備之外，其詩學理論更是有意識地批判與傳承明代前、後七子的詩學理念，且又針對明末以降的詩壇流弊。故此，藉著對沈德潛詩學的研究，必有助我們進一步省思明、清兩代詩學理論的發展、承傳以及演變關係。

本文首先敘述的是沈德潛詩學體系的建構過程，下

及 20 世紀有關沈德潛研究的評估，最後則是提出具體研究方法。

二、沈德潛生平及其詩學發展

關於沈德潛的生平事跡，最早的記載可見於袁枚（子才，1716-1798）為他撰寫的〈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憲公神道碑〉。² 以下將結合清代有關沈氏的史傳、鄉志及碑文，對沈氏生平作簡單扼要的探討。這裡所著重的是沈氏與當時詩壇人物的交往及其著述、評選的事跡，以期對這樣一位在詩學上繼往開來，有意識地為復古詩派在明末清初以來所存留的詩學困局尋找突破，並綜合、開創了一套博大深邃的詩學體系的一代宗師，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認識。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蘇州府長洲縣人，生於康熙十二年（1673），卒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享年 97。沈氏的祖先從浙江吳興竹墩遷居蘇州。³ 德潛初徙木瀆，後來移居郡城。五歲始從祖父沈欽圻學音韻。初

* 作者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高級講師、副課程主任。

- 1 前七子乃以李夢陽（獻吉，1472-1530）與何景明（仲默，1483-1521）為首，此外尚有徐禎卿（昌穀，1479-1511）、邊貢（廷實，1474-1532）、康海（德涵，1475-1540）、王九思（敬夫，1468-1551）、王廷相（子衡，1474-1544）；後七子乃以李攀龍（于麟，1514-1570）與王世貞（元美，1526-1590）為主，此外尚有謝榛（茂秦，1495-1575）、宗臣（子相，1525-1560）、梁有譽（公實，1519-1555）、徐中行（子興，1517-1578）與吳國倫（明卿，1524-1593）。因為彼等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文學觀念，故此一般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對這一流派也以「復古詩派」視之。
- 2 袁枚，〈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憲公神道碑〉，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下冊，卷 3，頁 1216-1218。而沈氏的故鄉蘇州的《蘇州府志》卷 89 亦載〈沈德潛傳〉。此外《清史列傳》卷 19、《清史稿》卷 305 及《國朝先正事略》卷 18 均有關於他的記載。
- 3 沈德潛，《沈歸愚詩文全集》（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年間刊本複印本），第 4 冊，〈年譜〉，頁 1。

讀書時，祖父問以平上去入，德潛皆能應對，祖父因而說：「是兒他日可成詩人」，⁴ 並賜詩以作嘉許。7歲（康熙十八年）隨祖父往著澤河宋氏館讀書。其父為家庭教師，可家境相當貧困。11歲的沈德潛日間讀《左傳》及韓文，晚上則讀唐律、絕詩以及古文選本。

然而，他對時文的訓練或有所不足，沈氏在19歲（1691）始應縣府試，而卻連續17次落第。這種推測可從他詠絕句時被老師制止、教訓得到印證，其師施星羽說：「勿荒正業，俟時藝工，以博風雅之趣可也。」⁵ 所謂的「正業」乃指學習應試的時文。施氏教授沈大約只有兩年多（1688-1690冬），後來因為沈氏家貧而辭去教席。康熙三十年（1691），沈氏受業於蔣濟選（覺周，長洲諸生）。⁶ 是年，他應縣府試，獲取錄；次年應院試不中。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後始讀《史記》、《漢書》，閒時則讀漢魏樂府，學成古文。一年後（1694），成秀才，為長洲博士弟子員。由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五十三年（1714）間，他共赴省試六次，皆不中。而這期間，德潛仍以授徒維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應張岳未的詩文會，並一起學詩於葉燮（星期，1627-1703）。⁷ 葉氏著有《原詩》一書，論詩之「變」而言上溯詩歌之源頭，這對沈德潛的詩學有極大的影響。葉氏曾以自己所製古文及門人之詩作寄給當時的以「神韻說」而名於世的詩壇盟主王士禛（貽上，1634-1711）。王士禛在覆信中指出沈德潛之詩作淵源葉燮，而且「不止得皮骨，直已得髓」。⁸ 據〈小山薑詩序〉所記，沈氏曾於三十歲時兩度寫信給王士禛，王氏亦曾覆信，然不久王氏即逝世，兩人始終緣慳一面。⁹

康熙四十六年（1707），沈德潛與張岳未、徐龍友、陳匡九、張永夫等友人成立「城南詩社」。康熙四十八年

（1709），與周允武及周準定交，周準後來與沈氏共同編選《明詩別裁集》。康熙五十四年（1715），開始批選唐詩十卷。次年，陳樹滋攜選稿到廣南刊刻，次年十月寄回，德潛為之補序。同月，沈氏開始選古詩，《古詩源》於次年二月編成。雍正三年（1725）十月，俞兆晟（叔穎，生卒年不詳）按崑科試，取沈德潛為一等第一，原卷：「融化經言，佐以議論，董醇賈茂，兩者兼之。」覆卷評：「金石奏而蟋蟀之鳴自破。」¹⁰ 歲終，《古詩源》刻成。開始選明詩。

雍正九年（1731），成《說詩碎語》兩卷。這一論詩專著，涵蓋面極廣，大如縱論詩之源流升降，微及章法句法以至音韻格調配襯，而其中對歷代詩歌得失，尤其是詩學方法論上的探討皆極之具體細緻，乃其詩學思想之精華所在。

同年三月，浙督李公聘沈德潛修浙江通志、西湖志（分列水利、名勝、祠墓、志餘四門），遍覽載籍。其時，交往的詩友頗多，計有方文輅、張存中、陳葆林、諸襄七、厲鶚（太鴻，1692-1752）、周蘭報、王介眉等，其中，厲鶚乃浙派宗主。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中雖說：

先生（沈德潛）誦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¹¹

然而，沈氏於《清詩別裁集》中卻對厲鶚有頗高的評價：

樊榭徵士，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詩亦清高，五古在劉慎虛，常建之間。今浙西談藝家專以釘釘擗擗為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真矣。¹²

4 《沈歸愚詩文全集》，第4冊，〈年譜〉，頁3。

5 同上註，頁6。

6 見〈蔣先生傳〉，《沈歸愚詩文全集》，第3冊，卷16。

7 同上註。

8 《沈歸愚詩文全集》，第4冊，〈年譜〉，頁8。

9 《歸愚詩文鈔》，續編，卷7。

10 《沈歸愚詩文全集》，第4冊，〈年譜〉，頁16。

11 《小倉山房詩文集》，第3冊，卷17，頁5。

12 沈德潛選評，《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卷24，頁424。

可見沈氏相當推崇厲氏的學問與詩歌，所批評的只是以厲氏為宗的浙派末流而已。在此，我們可見沈氏與宋詩派中人亦有來往，而且對宋詩派的評價亦相當公允。

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詔舉博學鴻辭，五月督撫三院考試，與試者三十一人，取六人，沈德潛獲第三。《明詩別裁集》亦於此際刻成，乃沈德潛對明代復古詩派的批判與肯定之選。其中對錢謙益之痛詆前、後七子頗多糾正，亦不乏批評，在選詩與評價上，均體現了沈德潛作為一代詩宗的胸襟與識見，亦乃研究其對明代復古詩派之批判與傳承關係的重要資料。

乾隆三年（1738）八月赴省試，九月開榜，共赴試17次的沈德潛終於考中第二名，與後來性靈派宗主袁枚同榜。次年二月應春官試，中六十五名，殿試第八，朝考第三。五月成進士，改庶吉士。十一月乞假歸里，仍以授徒維生。乾隆七年（1742）四月，散館御試，等第分第一，留館。六月九日輪班引見，乾隆諭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¹³命和消夏十詠五律，此後常奉命和御製詩，可見乾隆對他的恩寵，後來他將其與乾隆和唱之作輯成《矢音集》。同年九月，分修《明史》綱目。其後一年五遷至日講起居注官，可見恩眷甚隆。乾隆五年（1740）正月，校勘《舊唐書》完畢，開始校《新唐書》。由此便不難明白他何以在評唐詩中，尤其在《唐詩別裁集》與《杜詩偶評》中評杜詩時對唐代的史實及典章制度之嫻熟了。及後更是平步青雲，命為上書房行走。及至乾隆十四年（1749）因噎病未癒，奉旨不必到上書房，許歸故里，命校閱御製詩稿畢即起行。

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沈德潛評選的《杜詩偶評》刻成。有學者認為其《杜詩偶評》可能在教皇子杜詩時加以評選的。¹⁴事實上，此選多胎源於《唐詩別裁集》的杜詩之選。次年五月，開始評選《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冬月，批選《國朝詩別裁集》完畢。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蔣子宣刻成《清詩

別裁集》。因蔣氏的刻本錯別字太多，沈氏於次年三月命兒子種松重刻。越明年二月，增訂《清詩別裁集》刻成，十一月在京賀皇太后壽時進呈歷朝聖母圖冊及《清詩別裁集》。然而，乾隆卻下諭旨指出國朝詩選不應以錢謙益冠詩人之首，而戴名世為名教罪人，不應入選，且又直稱慎郡王名諱，著令南書房諸臣刪改，重付鑄刻。此選在在突顯了選詩者沈德潛與清廷在意識形態上的緊張關係。此等事實，正可駁歷來論者詆沈氏為帝皇粉飾太平之御用文人、封建幫兇之謬。

乾隆二十八年（1763）八月，增訂《唐詩別裁集》刻成，共20卷。至此沈德潛所評選的六種詩選，均已完整面世，其選本既有細緻的批評或鑒賞以至於作詩之法的導引，同時亦呈現了其條理分明的詩學理念，特別回應了自明中葉至清初由復古詩派所引發的詩學論爭，並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套創造性的詩學體系，為復古詩派的詩學困境作出了突破。故而，選本在沈德潛詩學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兩年後的閏二月十二日，加太子太傅銜。十九日，上諭德潛改食正一品俸。三月，舉九老會。四月，門生王廷魁為德潛鑄御製詩文及恭和御製詩，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年，前後共六卷。德潛的自訂年譜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止，是年已是94歲。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沈德潛逝世，享年97歲。

三、有關沈德潛研究的評估

關於沈德潛的研究，最早的研究者乃1938年吳興華的〈唐詩別裁書後〉一文。該文以文言文寫成，對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的選詩列出五點商榷的地方。¹⁵這僅是吳氏的讀後感而已。正式對沈德潛的詩論有較為深入探討的應是郭紹虞，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中，郭氏指出沈德潛的詩論乃格調與溫柔敦厚並重，此見可謂一錘定音。然而，郭氏只是將沈德潛

13 《沈歸愚詩文全集》，第4冊，〈年譜〉，頁27。

14 胡幼峰，《沈德潛詩學探研》（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頁24。

15 吳興華，〈唐詩別裁書後〉，《文學年報》，1938.4。收入《文學年報論文分類彙編》（香港：龍門書店，1969），第1冊，頁253-254。

附於其師葉燮之後，篇幅極短，未能對沈德潛的詩論作深入的探討。其實，郭氏早在1937年6月及1938年6月發表了〈神韻與格調〉與〈性靈說〉兩文，¹⁶前者探討了嚴羽（儀卿，1198-1241）詩論對明代前、後七子的格調說與王士禛神韻說的影響及兩者可溝通之處，而後者又從明代公安派的袁宏道而論到清代的袁枚。前者並未提及沈德潛的格調說與明代復古詩派的格調說以及王士禛神韻說以至於嚴羽詩論的關係，而後者亦沒有論及作為袁枚性靈說與沈德潛格調說的關係，即沈德潛的格調與袁枚的性靈有何溝通之處，雖然郭氏後來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中在討論嚴羽、明代復古詩派以及王士禛的神韻說時略有提及，然終非就沈德潛的詩論內涵及其所面向的詩學問題而作出全方位的論述。

在國外方面，最早研究沈德潛詩學者乃日本青木正兒（1887-1964）於1950年由岩波書店出版的《清代文學評論史》。¹⁷然此書只是通論，對沈氏詩論或者格調說與神韻說及性靈說的論述均是點到即止而已。相對來說，另一日本學者鈴木虎雄（1878-1963）在1951年出版的《支那詩論史》，¹⁸則對格調、神韻與性靈有頗多獨

到的見解。

1973年臺灣的吳宏一從其博士論文「清代詩學研究」中抽出討論沈德潛的部分，以〈沈德潛的格調說〉為題，刊登於《幼獅月刊》。¹⁹此文的特點是立論較為清晰，且對沈德潛格調說的後繼者有所介紹。1978年游國恩在其〈居學偶記——沈氏德潛《清詩別裁》之謬妄〉一文中指出沈德潛擅自篡改李來泰（仲章，？-1684）〈荆公故宅〉一詩，²⁰因此而質疑其選詩標準。同年，香港的蘇文擢自資出版了《說詩碎語詮評》一書。此書廣徵博引，但對《說詩碎語》其中詩學概念的關係脈絡以至於沈德潛的整個詩學體系卻未涉及。然而，此書充分突顯詮評者在詩學上的卓識博學，對於研究《說詩碎語》者來說，確是難得的參考書。1981年臺灣的吳瑞泉以「沈德潛及其格調說」²¹為其碩士論文，該論文集中心探討沈德潛的格調說，然未能窺及其詩學全豹。

80年代開始，大陸學者開始重新研究沈德潛。其中以1981年敏澤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對沈德潛的「溫柔敦厚」與「格調」均有所論述，然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及淵源方面的探討並未深入。²²同年，葉朗的

16 見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微捲資料，《燕京學報》21（1937.6）：145-176；23（1938.6）：47-92。郭紹虞的〈神韻與格調〉及〈性靈說〉，兩文後來輯成《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香港：崇文書店，1971）、（臺北：莊嚴出版社，1982）。本論文採用的是1971年的崇文書店版。

17 此書的中譯本亦有兩種。一為陳淑女翻譯，《清代文學評論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另一譯本由中國大陸的楊鐵嬰所譯，《清代文學評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18 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東京：弘文堂書房，1951）。此書的中譯本有兩種，除了本論文所引用由洪順隆翻譯，《中國詩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另一為中國大陸的許總翻譯，《中國詩論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19 吳宏一，〈沈德潛的格調說〉，《幼獅月刊》44.3（1976）：87-92。

20 游國恩，〈居學偶記——沈氏德潛《清詩別裁》之謬妄〉，《文史》5（1978.12）：129-130。李來泰原詩如下：「十年高臥此東峰，出處無端鬢已叢。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爭墩已賦三山石，記里猶傳九曜宮。漫向春風尋舊澤，史書功過亦濛濛。」李氏〈荆公故宅〉一詩原收入《蓮龕集》，乃和郡守蘇劍蒲〈臨川十詠〉之一。原詩對王安石抱有同情之意，旨在質疑史書之論。然而在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3中的李來泰〈荆公故宅〉卻面目全非，與原意相去極遠，《清詩別裁集》中李來泰之〈荆公故宅〉詩如下：「十年高臥此東峰，出處無端鬢已叢。洛蜀黨成疑誤國，熙豐法敝竟緣公。爭墩已賦三山石，記里猶傳九曜宮。漫向春風尋舊宅，生平功過史書中。」見《清詩別裁集》，卷3，頁60。其實在〈國朝詩別裁集序〉中沈德潛便說明：「此係增減第一次本也。初翻刻本，校對欠精，錯誤良多，甚有評語移入他篇者……玉南粵西江翻刻比初次刻本，錯字尤多，識者自能鑒識。」見《清詩別裁集》，頁2。沈氏又在凡例中羅列出錯別字，力求準確無誤，可見其選詩標準極之嚴謹。即使沈不滿李來泰對王安石的一生功績的肯定而篡改李來泰的〈荆公故宅〉也不太可能，他大可不選此詩，或可選收抨擊王安石的詩作，也犯不著在其選本中篡改此詩。

21 吳瑞泉，「沈德潛及其格調說」（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22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下冊，頁904-913。

〈關於沈德潛詩論的兩個問題〉一文圍繞沈德潛與葉燮及王士禛的詩論作出比較分析，然其過於強烈的以社會主義的色彩作為批判沈德潛詩學的立論根據，則顯得實為政治審判多於純學術上的理性分析。²³更近乎漫罵叫囂以至於人身攻擊的是劉世南的〈沈德潛論〉，此文從游國恩對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中篡改李來泰一事而開始質疑其人格，進而以極為侮辱性的字眼貶抑沈德潛的創作及詩論，認為其創作與詩論均乃維護封建階級的利益而已。²⁴而在同年，臺灣學者張健所著的《明清文學批評》一書在論述沈德潛的詩學理論時更是非常簡略，不足以見沈氏詩學之大略。²⁵相對來說，大陸學者王英志於1984年發表的〈沈德潛詩論精義述要〉一文，²⁶已開始肯定沈德潛詩論中有可取之處，從沈德潛對其師葉燮詩論的承傳出發，進而及於沈德潛本人的詩法剖析及溫柔敦厚與格調的討論，雖歸結於不能因人廢言，可始終又未脫濃烈的政治審判。

較為正面肯定沈德潛詩論成就的是由周秦與范建明合撰並於1984年發表的〈沈德潛與葉燮〉一文，該文探討了沈德潛對葉燮詩學的傳承，力證沈德潛並無違背葉燮詩論宗旨，這無疑是對葉朗一文的回應。²⁷同年廖仲安所撰的〈沈德潛詩述評〉一文，對沈德潛詩作上的暴露時弊加以肯定，而對其溫柔敦厚的筆法又不無鞭撻，然總的來說算是能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研究沈德潛的詩歌創作。²⁸

1985年李銳清發表了〈沈德潛「格調說」的來源及理論〉一文，此文追溯沈德潛格調的淵源，然未能發現

沈德潛在選本中實有格調之說，而對格調的分析亦僅止於沈德潛的詩論，亦不見任何有關於嚴羽及明代前、後七子在格調說上的影響的論述，乃此文的缺失所在。²⁹

1986年，臺灣的林秀蓉以「沈德潛及其弟子詩論之研究」為其碩士論文，該論文述及沈德潛的詩論，再探討其弟子對其詩論的承傳，此中不無新意。然限於要兼顧沈氏弟子方面的詩論，則不免削弱了對沈氏本人詩論的深入探討。³⁰同年，系統化地對沈德潛詩論作探討的，應是臺灣學者胡幼峰所著《沈德潛詩學探研》。此書以沈德潛的論詩宗旨出發，分別將沈德潛的詩論列作詩體論、創作論及風格論三大章，論述相當詳細，且對沈德潛的生平有深入的考察，是當時研究沈德潛較為深入的佳作。³¹唯一可議的是，該書未能與沈德潛詩論相關的共時性詩論，即如王士禛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以至於歷時性方面的嚴羽詩論及明代前、後七子的格調說一併作出探討。胡教授對沈德潛的研究鍥而不捨，在1988年又發表了〈試論《唐詩別裁集》編選之得失〉，³²這應是對《沈德潛詩論探研》一書的補缺。

90年代是沈德潛研究趨於嚴謹及以學術性為主導的年代。1990年，吳宏一發表了〈沈德潛《說詩碎語》研究〉一文，先是對此書的版本作考究，然後追溯其理論淵源，再回到《說詩碎語》一書的理論論析。³³此文一如既往，具體清晰，是討論《說詩碎語》時很好的參考資料。同樣以《說詩碎語》為研究對象，朱自力的《說詩碎語論歷代詩》一書則從《說詩碎語》中抽出沈德潛有關歷代詩歌的評論，以朝代作區分，內再細分對不同

23 葉朗，〈關於沈德潛詩論的兩個問題〉，《文學評論叢刊》9（1981）：34-50。

24 劉世南，〈沈德潛論〉，《江西師院學報（哲社版）》1983.2：34-42。

25 張健，《明清文學批評》（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頁174-179。

26 王英志，〈沈德潛詩論精義述要〉，《文學評論叢刊》22（1984）：339-366。

27 周秦、范建明，〈沈德潛與葉燮〉，《學術月刊》6（1984.6）：79-81。

28 廖仲安，〈沈德潛詩述評〉，《文學遺產》1984.2：65-70。

29 李銳清，〈沈德潛「格調說」的來源及理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6（1985）：161-177。

30 林秀蓉，「沈德潛及其弟子詩論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31 胡幼峰，〈沈德潛的「創作論」〉上、下，《中外文學》14.8（1986）、14.9（1986）。

32 胡幼峰，〈試論《唐詩別裁集》編選之得失〉，《古典文學》1988.10：327-358。

33 吳宏一，〈沈德潛《說詩碎語》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19.1（1990）：1-24。

詩體的論述，後面有朱氏自己的解說。此書的好處在於令人一目了然，對各朝代各詩體的評論，是研究《說詩碎語》者必備的參考書之一。³⁴

1995年由鄔國平與王鎮遠合撰的《清代文學批評史》一書有關沈德潛詩論的論述較為突出的是探討了沈德潛「格調」與王士禛「神韻」的關係，³⁵然亦未見深入。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中國語文及文學部研究生譚卓培所撰的畢業論文「沈德潛宋金三家詩選研究」探討了沈德潛罕為人知的《宋金三家詩選》這一選本，這無疑是一有趣的研究角度。然而從沈德潛晚年的這一未完全評點完畢即逝世的選本，既未能窺及沈德潛的詩論核心，而且「格調」與「詩教」之最高典範在沈氏詩論中乃唐詩或杜甫，方為正宗，而譚氏在此卻以「言格調」與「倡詩教」作為考察其尚未完成的宋詩選本的基準，確實頗值得商榷。而且，譚氏在沈德潛詩論體系中「格調」與「詩教」這兩個繁複多義的詩學概念的淵源及沈氏本人在這兩個概念上的創變，並沒有作出深入的發掘與闡釋，便將之作為評詩基準，顯然不妥。

1997年有兩篇研究沈德潛的文章：一是吳兆路的〈沈德潛「溫柔敦厚」說新解〉；³⁶另一篇乃霍有明的〈論沈德潛的詩歌理論和創作〉。³⁷前者肯定沈德潛「溫柔敦厚」的詩論，而其選詩與評詩均不囿於溫柔敦厚，並認為其創作與詩論均是對「儒家溫柔敦厚詩教傳統的突破和發展」；後者則從沈德潛的詩論而論及其詩作，然兩者之間有何關聯並未述及，顯得頗為突兀。

從1988年以來已有人觸及沈德潛的杜詩學。首先是許總在〈明清杜詩學概觀〉中述及，基於範圍廣泛，

並未能對沈德潛的杜詩學有深入的探討。³⁸1994年胡可先發表了〈沈德潛杜詩學述略〉一文，對杜詩學作為沈德潛詩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了充分的肯定。³⁹袁志彬在1995年發表了〈沈德潛及其杜詩論（上）〉及〈沈德潛及其杜詩論（續）〉兩文。這兩篇文章相當詳細地探討到沈德潛的評點杜詩，而卻認為沈德潛對唐詩作法的剖析乃為令讀者去再現唐代盛世的詩歌以滿足乾隆之見，則難以令人信服。強將沈德潛詩論判定為政治服務，乃袁氏這兩篇文章之不足。⁴⁰

四、餘論

當沈德潛在世以詩學為世人所知開始，便被視為明代格調派的傳承者。明代的格調詩學之代表人物乃李攀龍，而代表格調詩學理念的則具體落實在其《古今詩刪》中的「唐詩選」。故此，要研究沈德潛與明代復古詩派在詩學理念上的關係，可將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與《古今詩刪》中的「唐詩選」作比較研究，便可具體呈現兩者之異同及承傳關係。⁴¹具體而言，從明末刊刻而顯赫一時作為明代復古詩派理論的具體實踐的《古今詩刪》中的「唐詩選」，回顧整個明代詩壇的思潮與論爭的徵結所在，從而又為活躍於清初至中葉的沈德潛的詩學理論對當時詩壇論爭的針對性作具體的背景探索。繼而在探討明末以來至清代的沈德潛對明代復古詩派的復古文學史觀上的討論，藉以突顯沈德潛作為清代格調派宗主對明代以前、後七子為首的格調派文學史觀的突破。而其中再就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的文學史觀及其所引起的論爭為切入點，作為具體的論述

34 朱自力，《說詩碎語論歷代詩》（臺北：里仁書局，1994）。

35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432-451。

36 吳兆路，〈沈德潛「溫柔敦厚」說新解〉，《文學遺產》1997.4: 90。

37 霍有明，〈論沈德潛的詩歌理論及創作〉，《論唐詩繁榮與清詩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79-190。

38 許總，〈明清杜詩學概觀〉，《文學遺產》1988.6: 15-124。

39 胡可先，〈沈德潛杜詩學述略〉，《杜甫研究學刊》1994.1: 37-44。

40 袁志彬，〈沈德潛及其杜詩論（上）〉，《杜甫研究學刊》1995.3: 44-53；袁志彬，〈沈德潛及其杜詩論（續）〉，《杜甫研究學刊》1995.4: 17-26 轉44。

41 相關論述可參陳岸峰，〈《唐詩別裁集》與《古今詩刪》中「唐詩選」的比較研究：論沈德潛對李攀龍詩學理念的傳承與批判〉，《漢學研究》19.2（2001.12）：399-416。

焦點，這樣就更能清晰地體現沈氏的文學史觀。

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所追求的是獲取盛唐格調，這是就方法論上而言的。這樣才有文學史上著名的李夢陽與何景明二人關於詩法之爭，而沈德潛則在「意」與「法」之間突破了明代復古詩派的文學史觀及其在詩學方法論上的桎梏。沈德潛的詩學理論中「格調」與「溫柔敦厚」這兩個重要而又彼此相緊密聯繫的詩學概念，既是一種詩歌風格，亦是一種創作的的方法論。格調的追求可追溯至沈氏對明代李東陽至前、後七子「格調」說的傳承與突破。其突破處，一方面可見於他在「格調」這一詩學概念方面翔實而詳細的論述，更可見於他著力於對王士禛「神韻」說的糾偏，而袁枚對沈氏「格調」說的攻擊亦可讓我們從另一角度透視沈氏對「格調」理解。⁴²

沈氏用以相輔並濟「格調」說的是回到傳統儒家詩觀的「溫柔敦厚」。從清初至乾隆時代的文字獄、科舉要求，大吏對詩教、盛世之音的鼓吹以至於官方編修的種種選本所透露對意識形態控制的訊息，以探討官方意識形態對沈氏詩論的影響。由沈氏詩論與清廷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索，所揭示的是詩學與權力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詩論以至於評詩的整體檢索，我們更能明

瞭沈氏詩論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真相。我們亟於揭示的是，作為詩論而言，怎樣的作品才符合「格調」的要求？「格調」有甚麼不同的類別？如何唱出盛世之音？如何作「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音而不失「溫柔敦厚」？怎樣才是「溫柔敦厚」？⁴³

從李攀龍所編選的《古今詩刪》中「唐詩選」在明末至清中葉前備受爭論的情況，作為考察明末至清中葉前詩壇概況的途徑，這有助於瞭解沈德潛所編選的六種選本所面向的詩壇困境，透過他在選錄詩人的取捨上，收錄詩作的數量，作品體裁上的比重，以及對詩人、對具體作品的批評以至於對歷代詩歌的評價，再透過相關選本的比較，這樣便能突顯沈氏選本的獨特性，以及選本所體現的詩觀與理論層面之間所引發的張力，這樣由理論的理解與闡釋而劍及履及於具體的批評，由理論到實踐，這樣我們便更能全面地理解沈氏對明末以來詩壇所面對的問題及其回應。⁴⁴

以上的研究，乃就沈德潛所面對的詩學問題及其回應而作具體化的論述。而從沈德潛的個案研究，進行輻射到了明、清詩學，擴而廣之即俯瞰了整個中國詩學的問題。此乃筆者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研究沈德潛詩學體系的方法及心得，在此拋磚引玉，以俟來者。

42 相關論述可參陳岸峰，〈格調的追求：論沈德潛對明清詩學的傳承與突破〉，《漢學研究》24.2（2006.12）：225-254。

43 相關論述可參陳岸峰，〈詩學與政治的張力：論沈德潛詩論的「溫柔敦厚」〉，《九州學林》2007（冬）：35-61。

44 相關論述可參陳岸峰，〈別裁偽體歸雅正：論沈德潛編選的六種選本〉，《九州學林》2005.1（春）：276-315。

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

漢學研究中心為擴大服務國內外漢學界，自 2009 年元月起建置完成「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並開放免費瀏覽利用。本資料庫係將《漢學研究》和《漢學研究通訊》二種期刊，自創刊以來各期文章逐篇予以數位化影像掃描，在取得作者授權後，提供全文影像上網供眾瀏覽、查詢和列印。

本資料庫置於漢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ccs.ncl.edu.tw>）「專題資料庫」，提供下列檢索方式：1. 刊期瀏覽；2. 作者、篇名、關鍵詞、摘要的全文檢索。歡迎學界利用。並期盼尚未授權的作者，主動與本中心聯絡。

地址：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 ccstcc@ncl.edu.tw <http://ccs.ncl.edu.tw>